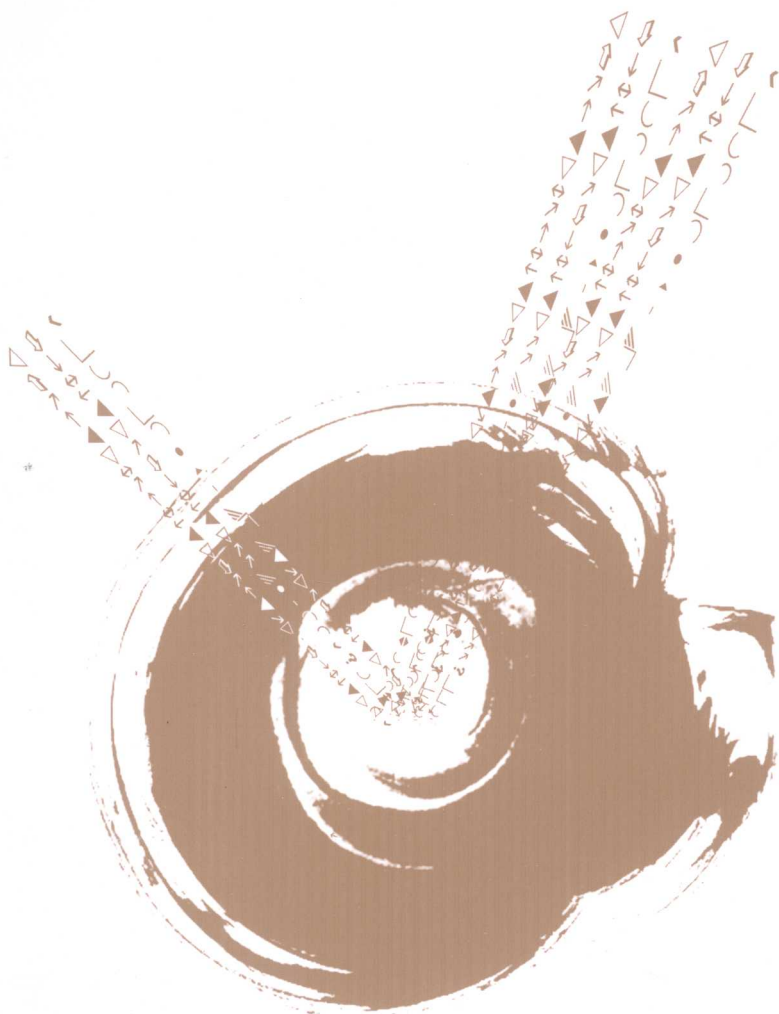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长三角研究系列



冲突与和谐： 长三角经济发展经验

CHONGTU YU HEXIE: CHANGSANJIAO JINGJI FAZHAN JINGYAN

刘志彪 郑江淮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2008年度研究项目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ZHONG GUO JING JI WEN TI CONG SHU

长 三 角 研 究 系 列

冲突与和谐：长三角经济发展经验

CHONGTU YU HEXIE: CHANGSANJIAO JINGJI FAZHAN JINGYAN

刘志彪 郑江淮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冲突与和谐: 长三角经济发展经验/刘志彪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长三角研究系列)

ISBN 978-7-300-11597-9

I. ①冲…

II. ①刘…

III. ①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经验

IV. ①F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9794 号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长三角研究系列

冲突与和谐: 长三角经济发展经验

刘志彪 郑江淮 等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1.12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70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作者目录

第一章	刘志彪	张 杰	
第二章	郑江淮	高彦彦	
第三章	刘志彪	李晓蓉	
第四章	江 静		
第五章	付文林		
第六章	吴福象		
第七章	巫 强		
第八章	谢建国	吴丹丹	
第九章	徐 频	刘志彪	
第十章	魏守华		
第十一章	李晓春	朱卓然	钱晓颖
第十二章	赵 华		
第十三章	姜 宁	郑小婧	
第十四章	姜 宁	唐 品	
第十五章	武志伟	陈 莹	
第十六章	高 波	王辉龙	
第十七章	葛 扬		
第十八章	郑江淮	陆明君	
第十九章	顾 江		
第二十章	李晓春	谢 凯	陈亚栋 顾晓燕
第二十一章	尚长风	曾 平	吴海红 胡文卿 白会平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总 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前 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就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协调同步发展。这意味着我们长期实施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领域法则，逐步转化为效率和公平协调的发展原则。这是中国改革努力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问题。

所谓和谐社会就是一个让各利益主体充分表达自己利益诉求且能够在充分博弈的基础上，逐步化解各方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基本均衡的社会。按照这个理解，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是：（1）建立和形成分散的利益主体；（2）建立和完善利益主体的合



理、合法的具体的表达机制；(3) 建立和实现各分散的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分散的利益主体已经充分建立之后，如何建立和完善后两个机制，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执政党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制度化的框架。

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力和制度框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缺少经济发展的实力，社会稳定这一和谐社会的底线就无法确立；而如果缺乏规范的制度框架，就无法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更难以在一个有效的制度空间中建立起利益的均衡和社会发展平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由于经济国际化的程度和人均发展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二元经济结构的逐步消除，由于市场发展的深化和各种制度建设的领先，因此理应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充当排头兵和先锋队。正是基于这一看法，我们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自己的研究队伍，对长三角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与和谐进行考察，从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及其福利变化等三个方面揭示长三角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经验特色。我们没有拘泥于通常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完备性，而是侧重于考察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特殊的现象和发展方式，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证检验，得出可供政策咨询的结论。

首先，从总体上看，长三角经济发展呈现出两个特色，一是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加入全球价值链(GVC)，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承接国外先进制造业资本



转移,主要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微利化、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加工、制造或组装环节,推动了长三角地区工业化新阶段的实现。第一章在此背景下,侧重于分析这个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蕴含着一个不和谐因素,即在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 GVC 生产分工体系中,长三角制造企业实现自身的顺利升级面临着被“俘获”与“压榨”的障碍。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本土市场内需规模的扩大与空间结构的改变,大量长三角制造企业似乎并不是致力于国内价值链(NVC)的构建以及由 GVC 向 NVC 的转化与协调发展,具体说,它们似乎既不看重国内市场,也不力图通过打造国内品牌获取国内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而是竞相以代工或贴牌(OEM)方式,参与到主要由发达国家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主导与控制的 GVC 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同时,在国外市场也不追求构建产品的自有品牌,而是使用国外采购商或发包者的品牌、依赖于国外发包者的销售终端渠道,以低廉的产品价格来获取国外发包商的生产订单。究其原因,本章从收入分配不平等、制度因素、地方政府竞争等方面作出了解释,并且针对 GVC 对我国制造企业所造成的发展困境,提出了构建基于中国本土市场的 NVC 的发展战略,通过对中国情境下构建 NVC 的两种重要载体——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专业化市场)和单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领导型企业网络)的对比分析,指出了依靠 NVC 来实现制造企业升级的具体方式。

另一个特色是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背景下,长三角吸引了大量本地农村劳动力和外地劳动力的转移,有效地支持了长三角发达地区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与此同



时，也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景象，即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失的同时，出现了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并存的二元格局。本书第二章以江苏苏南和苏北发展差距作为经验基础，提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双二元经济结构”，指出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劳动力是缩小城乡，从而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核心机制；然而，随着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入，城市的边界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由于资本和劳动的高度集中往往会带来城市的规模不经济，低技术含量和人力资本的产业资本的回报率会随着地租的上升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下降，而落后地区在这些方面仍然具有很强的优势，再加上落后地区提供有吸引力的“政策租”，导致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将会向落后地区转移。以产业转移为背景的落后地区的发展重新形成一个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劳动力不断从落后地区的农业向落后地区的工业转移。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目前在苏北出现的劳动力流转从“外地转移”向“就地转移”的变迁机制。随着产业转移背景下劳动力转移方式的变化，区域之间将形成一种新的产业分工格局：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形成劳动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分工格局。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地在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转换，不仅在城乡二元上而且在区域二元上形成一体化的格局，最终整个经济体成为一个发达的一元经济。在这种一元经济体中，地区之间的差距只是表现为产业分工格局的差异，而不是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之间的差异。

此外，长三角经济发展特色的形成依赖于特殊的动力机制。我们分别从地方政府竞争、外向型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技能提升等方面进行了概括。

地方政府及其之间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



力，这在长三角地区显得尤为突出。第三章从经济转型角度，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两省一市的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指出我国经济转型在市场发育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必须以政府转型和培育市场为主体内容，而政府的转型更是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由于经济转型的目标制度框架是无法事先给定的，所有的决策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市场中其他主体，都必须积极地寻找新的替代性制度框架。由于他们拥有的是不完全信息，同时他们本身也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和企业能够在转型的冲突与不确定性中寻求到和谐的结合点，无疑将为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验表明，市场化过程与政府的介入不是相互排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很多手段提高市场功能，反之，市场力量也能促进政府功能的完善。政府功能和市场主体，作为资源配置的对称机制，可以有多种形式的组合。上海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线的政府主导模式，而江苏的苏南模式则是“强政府”传统与集体经济的结合，与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民营经济的自发创新模式。虽然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传统和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差异，但地方政府因势利导进行自主创新，选择不同的道路，找到有效的激励安排才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章在上述认识的前提下，针对德国学者 Herrmann-Pillath 在比较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体制转型力量时指出的地方政府竞争会导致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出现差异性这个假说，利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经验和数据，论证了在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主要体现为地方经济的 GDP 增

长时，地方政府为能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获胜，必然会形成对资源的争夺，从而引发地方政府间竞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由于缺乏预算约束，在政治锦标赛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 GDP 增长而不断争夺资源，其努力程度不断提高，从而导致竞争激烈程度不断提高。随着为增长而进行的竞争的不断加剧，两地政府不断进行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苏南从乡镇企业改制到招商引资，而温州也从依靠民营经济的出口导向到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从而客观上形成了发展模式的趋同。

地方政府竞争产生于财政分权体制，这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切合当地居民的偏好，但与此同时，过度的税收竞争也会引发投资的超常性增长，降低整体投资区域配置绩效，导致宏观经济过度波动，对经济长期的持续性发展带来损害。第五章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对招商引资竞争有积极作用，随着近年来长三角各城市纷纷出台各种鼓励企业总部迁入的优惠政策，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如何协调好长三角地区各市的经济利益，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提高长三角地区产业分工的总体经济效率是长三角经过竞争之后走向合作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政绩、晋升的影响基础是否根本改变，尤其是需要加快推进官员绩效考核的民主监督，以及从促进社会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加大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力度。

虽然造成长三角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体制原因是财政分权，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在财政分权体制下考察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就会发现，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地方投融资



资权和企业管辖权，其后果是对地方税收有重要贡献的地方企业常常作为地方保护和支持的主要对象，在经济发展处于相同的阶段和拥有相同初始禀赋的情况下，各地的产业投资有可能集中在相同的产业上，造成所谓的重复建设。第六章实证分析发现，自2000年以来，长三角产业结构并没有出现以往人们所普遍认为的产业同构现象。以往的研究之所以认为长三角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主要是因为统计口径过于宽泛，没有准确地反映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况。事实上，长三角两省一市产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即使存在投资趋同，也是与投资的性质有关，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会导致产业同构上升，而“蒂伯特”选择机制下的行业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的公共投资降低了产业同构，三资企业投资的作用也是降低产业同构。因此，为了贯彻国务院鼓励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和改革的精神，长三角制造业要进一步实行差别化定位。

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在长三角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却表现出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即长三角的出口大户往往是进口大户，更具体地说，是机器设备的进口大户。为什么他们需要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呢？第七章研究指出，这是由于长三角地区企业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为实现出口创汇必须使其产品符合国际市场要求，具体而言，就是产品质量必须不断满足国外消费者的标准与外国政府的出口规制。而在本土装备制造业水平相对落后，无法提供合格生产设备的条件下，长三角出口企业只能为了出口而进口。所以长三角地区出口大户同时也是进口大户这一规律性事实是出口导向战略与我国装备制造业相对落后两者综合后的必然结果。这种出口可认为是“进口引致型出口”，即当本土



装备制造业水平相对落后时，我国出口厂商进口国际先进的机器设备并投入生产，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实现产品更多的出口。

为出口而进口支撑了我国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但是也带来了相应问题。这主要是国外机器设备进口挤压本土装备制造厂商的市场空间，令后者一方面处于技术追赶状态，另一方面还陷于市场追赶状态。而这两种赶超之间还彼此影响，没有市场份额的保证就无法实现技术追赶，而技术越落后于人就会越丧失市场份额，尤其是高端装备的市场份额。这是我国出口导向战略实施导致的严峻问题：虽然下游出口行业发展迅猛，但是更多的出口依赖于更多的国外设备进口，导致本土装备制造业国内市场份额萎缩。这就体现为上游装备制造厂商与下游出口厂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将装备制造业大多布局在中西部地区，而改革开放后外向型经济发展最好的是东部地区。在为出口而进口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越迅速，对中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市场挤压就越明显。于是国内上下游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上升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即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矛盾冲突。这是本章的第二个研究主题。

尽管如此，长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大发展客观上产生了经济外部性。第八章以江苏为例研究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中 FDI 对内资企业的后向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 对内资企业的后向溢出强度低于水平溢出强度，表明行业内溢出仍然是江苏省制造业集群外资溢出的主要渠道。本章还发现了规模效应与技术差距显著地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溢出，企业的规模越大、与外资的技术差距越小，从 FDI



所获得的水平溢出效应就越大，但是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后向溢出受到了规模效应与技术差异的影响。在不同要素密集类型行业产业集群中，FDI 对内资企业的后向溢出效应不同：FDI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本地供应商后向溢出效应相对明显，但是并没有发现 FDI 对本地的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产生了显著的后向溢出效应，这表明，外资企业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内资企业并未建立紧密的前后向的生产关联，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本地企业自身发展水平局限，难以与外资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进行技术衔接，再加上面临与跨国公司投资的原有配套企业和其他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使得本土企业难以融入高技术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或者虽然融入了高技术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但是处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从而限制了 FDI 对本土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后向溢出效应的产生。

第九章以昆山经济增长为例，探讨了以外资为主导，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以此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模式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为地区经济注入先进技术，提高了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民营经济受到外资挤压，居民主要为外资打工，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外源技术引进，对外资形成路径依赖。而吸引外资的最主要因素是廉价劳动力，因此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中，要保持经济增长，必须保持较低的劳动力要素成本，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和外资的持续引进，由此造成了工资率及居民收入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的现象。昆山居民的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差距不断拉大，利润在外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分配出现明显的不平衡，且在外资企业中尤为明显。



以上我们关注了长三角外向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和绩效，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内自主技术创新在长三角的表现。第十章研究发现，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内在创新努力是产业创新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本土技术溢出效应表现为负的外部性，当周边省区 R&D 经费总支出每增加 10%，本区创新绩效就大约降低 1%，显示了产业专业化集聚不利于创新，意味着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存在同质化竞争。出口学习效应对产业创新绩效有较强的贡献弹性，既说明了长三角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又说明了进一步积极利用国际技术溢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必要性；从产业创新的机会窗口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高技术产业巨大的市场环境更多是诱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开拓市场，尚未迫使企业形成以创新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从区域维看，如果把上海、江苏、浙江技术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区（相对而言），则低技术水平区从高技术水平区受益，反之亦然，可能是无序竞争和模仿不利于保护创新者利益；但当技术水平差异较大时，高技术水平区也可从低技术水平区受益，可能是技术适度扩散有利于增加创新者利益。

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还可以从生产要素投入及其升级角度归纳。（1）从劳动技能角度看，目前遇到了“技工荒”，表明长三角产业结构从依赖于简单劳动力的粗放、大规模投入的结构开始转型升级。第十一章研究指出，“技工荒”的实质是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企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和供给劳动力的低人力资本水平所形成的矛盾的结果，要使长三角产业结构的升级顺利进行，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2）从土地利用角度看，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实现是资



本、劳动力、技术等主要生产要素投入规模增长的结果。但同时,上述所有要素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更大规模的新增土地投入为基础的。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成为首要经济目标的今天,在既定的要素效率水平下,土地的稀缺性以及边际报酬递减将可能在未来共同对单纯依靠要素规模扩大的增长模式产生约束作用。第十二章研究发现,在目前的产业布局结构和城市发展规划条件下,近20年来上海大规模投入新的土地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急速扩大以及大规模综合城市开发的需要。上海扩大土地供给的做法对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若除去战略性城市开发因素,上海的土地贡献呈微弱下降趋势,这说明由于土地边际贡献递减的影响,以目前上海的发展状态和产业结构,即使资本技术密集的高效率产业比重较大,今后一味依靠土地投入来扩展这类产业的规模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不可持续。

与上海不同的是,南京等区域中心城市表现为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全面大量投入共同促进经济增长。但在2004年之后,若不考虑城市开发下的行政区划转移合并,土地的贡献率也已趋于基本稳定,即今后土地的追加投入促进增长的效果已经不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南京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已经有必要对当前的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加大资本技术密集而土地相对需求较小的高附加值工业或现代服务业的比重。

以绍兴为代表的普通城市由于经济规模和原主城区面积相对有限,近20年土地对经济的平均贡献超过南京等中心城市的事实表明,这类城市还存在通过扩大土地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但土地扩大潜在边际贡献率的作用趋于消失